

【历史研究】

旨扬罍与韩国世系校正*

马超 邹芙都

摘要:从器形考证,旨扬罍应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器。罍铭所见人名有“韩告公”及其子“旨扬”,“韩告公”之“韩”应指东周以后的晋国韩氏。铭文中的“旨扬”应该为“启章”,是韩武子私名,据此则知“韩告公”当即韩武子之父“韩康子”。“告”与“康”二字在战国及秦文字中写法相似,史书“韩康子”之“康”很可能是“告”字形似之误。

关键词:旨扬罍;韩国世系;韩告公

中图分类号:K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0)10-0144-05

20世纪80年代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城西桥乡偶岗村刺墩遗址出土有一件具铭的青铜罍,曾先后著录于《肥西县志》^①、《安徽江淮地区商周青铜器》^②、《安徽商周金文汇编》^③等书,现藏肥西县文物管理所。罍通高27.3厘米^④,口长径为18.6厘米,重4.9千克,共有铭文4行15字,铸于正面钲部和两侧铣部^⑤,参照诸家意见,其释文当为:韩告公之子(左铣)/旨扬择/其吉金,(钲部)/以铸祭钟。(右铣)^⑥。该器形制为罍,而自名为“钟”,与已见于著录的宋公戌罍^⑦、滕侯𨮒罍^⑧、莒子受罍^⑨等一致,这是由于罍属于广义的钟类。^⑩据铭文可知器主为“旨扬”,身为“韩告公”之子,器乃专为祭祀所作,可命名为“旨扬罍”。铜罍铭文所见“韩告公”与“旨扬”这对父子,对于研究东周时期韩国的世系具有重要价值,可以校正传世文献之误。本文即拟对此试做讨论,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旨扬罍年代考证

最早著录旨扬罍信息的《肥西县志》称其为“青铜罍钟”,关于年代则仅言为“春秋时代乐器”^⑪,此

后的《安徽江淮地区商周青铜器》与《安徽商周金文汇编》两书均承袭此说,同样是笼统地将其时代定为“春秋”,而没有进一步地细化考证。^⑫旨扬罍的器形照片和拓本等资料已见于上述著录中,《肥西县志》虽未刊布器形和铭文资料,但却对其形制有过详细描述:伏兽形扁钮,由八条螭兽成双对峙组成。篆部、舞部和隧部饰蟠虺纹,鼓部两侧各伸出三条弯曲向前平视的三兽首,18只螺旋形小圆枚分三排缀于两边篆间,枚间无地纹,镇^⑬部呈梯形。^⑭

旨扬罍在形制上突出的特点为:没有扉棱,两侧斜直外张,以多条相交的螭龙纹为钮,并饰以螺旋纹形枚。按照《中国青铜器综论》对青铜罍的分类,旨扬罍当属于其中的V式罍。此类罍的特征是:中腰不外鼓,两侧近直或微斜直外张。或上部微收敛,鼓中下部微斜直外张。钲部仿钟体而具篆、枚,舞上部多以透雕状的勾联的双龙或多条龙为钮,无扉棱。标本有河南叶县旧县M4所出罍(M4:8),山西太原金胜村出土的铜罍(M251:203),山西潞城潞河所出铜罍(M7:11),汲县山彪镇所出铜罍(M1:9)^⑮,还有河南浙川和尚岭出土的莒子受罍以及安徽寿县出

收稿日期:2020-03-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金文所见两周古国爵姓及存灭史料整理与研究”(19CZS01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金文所见古国、古族姓氏资料整理与研究”(18YJC770022);西南大学创新团队项目“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SWU200910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商周金文字词集注与释译”(13&ZD130)。

作者简介:马超,男,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讲师,文学博士(重庆 400715)。

邹芙都,男,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 400715)。

土的蔡侯申钫等^⑩。

河南叶县旧县 M4 所出铜钫,有蟠龙纹复式纽^⑪,铉部向下渐阔,于口接近平齐。正背面分别饰相对称的四组 36 颗螺旋形枚,枚间篆部饰蟠螭纹,复纽的龙身上刻有细致的雷纹。据同墓所出许公宁戈(M4:109)等器,知墓主当为许公宁也即文献记载中的许灵公,于公元前 591—前 547 在位,故此墓葬年代属于春秋晚期偏早。^⑫

莒子受钫舞上有两条夔龙纹组成的钮,篆间有螺旋形枚,每面 18 个枚,正背面共有 36 个枚。钫口近平。舞部饰蟠螭纹,篆带饰三角形云纹或夔龙纹,正鼓部饰蟠龙纹。^⑬钫铭开篇记时“唯十又四年三月,月唯戊申,亡作,昧爽”,李家浩先生曾指出,“十又四年”为某位楚王的纪年,“月唯戊申”的“月”意为“月朔”^⑭,胡长春先生与笔者又补充论证“亡作”一词当读为“荒落”,是《尔雅·释天》所言:“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在巳曰大荒落”中“大荒落”的省称,并据此推算出钫铭所记当是楚康王十四年,也即公元前 546 年。^⑮

蔡侯申钫钮部由多条相交的蟠螭纹组成,正背两面各有 18 个低矮的螺旋纹形枚,舞部、篆间、鼓部饰以蟠螭纹,两侧斜直。陈梦家先生最早指出寿县蔡侯墓墓主应为蔡昭侯^⑯,后经裘锡圭、李家浩先生对蔡侯之名“申”字的考证^⑰,使此说成为定谥,蔡昭侯于公元前 518 年——公元前 491 年在位,属春秋晚期晚段。

除此以外,见于著录的还有几件与旨扬钫形制接近的出土铜钫,虽不具铭文,但通过器形与墓葬资料等内容亦可推知其大体年代,以作参证。如:山西太原金胜村出土的铜钫,钟体正视呈梯形。纽饰作两夔龙相对峙衔梁状。舞饰蟠螭纹。铉部篆带上下及两篆间各有团身螭兽形枚突,正背共 36 枚。两鼓面饰夔龙夔凤纹,墓葬年代属春秋晚期。^⑱山西潞城潞河所出铜钫,纽呈伏兽状,平于,枚呈泡形,上浮雕盘龙纹,篆间饰云纹,鼓上饰回纹,墓葬年代为战国初期。^⑲汲县山彪镇所出铜钫,复钮直悬,舞饰蟠螭纹,篆饰回字纹,鼓饰饕餮纹,其时代为战国早期。^⑳

综上所述,旨扬钫所属的 V 式铜钫可考定的年代,主要集中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因此若从器物形制的角度来推论,旨扬钫的年代也应大致处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这一时间段内,这是我们探究钫铭相关史实的重要线索和前提条件。

二、旨扬钫的国族归属

钫铭中器主“旨扬”自称为“韩告公之子”,则其属韩氏无疑,据传世文献记载西周封国中有一韩国。《诗经·大雅·韩奕》:“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有倬其道。韩侯受命,王亲命之。”《诗序》云:“《韩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锡命诸侯。”^㉑此诗是宣王时期即有韩国的明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邠、晋、应、韩,武之穆也。”又襄公二十九年:“虞、虢、焦、滑、霍、杨、韩、魏,皆姬姓也。”^㉒是知西周之韩国当为武王之后,属姬姓。

除传世典籍以外,在近几年刊布的金文资料中亦发现有西周韩国点滴史迹,弥足可贵。2014 年冬陕西岐山县京当镇贺家村北墓地,出土有数件器主为昔鸡的铜器^㉓,其中的昔鸡簋铭文称:“王娵(姒)呼昔奚(鸡)遑(迓/御)芴姑于韩,韩侯宾用贝、马。敢扬王休,用作尊彝。”^㉔

据有关研究成果,铭文所记乃是:王姒命昔鸡前往韩国迎接芴姑,韩侯赐给昔鸡贝和马,昔鸡称扬王的恩宠,铸作宗庙祭器。^㉕“芴姑”应是即将嫁入周王室的女子。《左传》文公四年:“逆妇姜于齐,卿不行,非礼也。”郑笺:“礼,诸侯有故,则使卿逆。”^㉖簋铭中的昔鸡正是为周王到韩国去迎妇的使者^㉗。此外,《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还公布有一件以往未见于著录的垣伯丰鼎,铭文为:唯十月既生霸甲辰,在成周,史至,以兹令曰:内史曰:“告垣伯,𡗗(嗟),伯氏宕。卿事辞曰:‘仑(论)。”今我既即令曰:‘先王令尚付。’”垣伯丰作宝肆彝。^㉘

鼎铭“垣伯”之“垣”原从庸、𡗗声,谢明文先生将其读为韩国之“韩”,认为这位“垣(韩)伯”乃武王之后。^㉙昔鸡簋的年代属于西周中期前段,垣(韩)伯丰鼎的时代则是西周早期,此二器是目前出土文献所见时代最早西周韩国史料,证实了韩于西周早期即已立国的史实,铭文中出现的“韩伯丰”与“韩侯”,则是先后在位的两位韩国君主。

西周之韩国虽已数见于传世文献以及铜器铭文,但是关于其地望问题学界却一直存有争议,大致可分为河西说,即陕西韩城说;河东说,即山西河津、万荣说;河北说,即河北固安说;此外还有迁徙说,包括河北迁往河西、河西迁往河北两种意见;甚至有学者提出过西周应有两个姬姓韩国,以调和文献中有关韩国地望的矛盾。诸说各据典籍勾稽为证,莫衷

一是,韩分二国之说同样难以令人信服³⁶,有关问题的解决,仍有待于将来。

与地望问题的扑朔迷离不同,西周韩国的灭亡时间则是史有明载,学界观点较为统一的。《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虞、虢、焦、滑、霍、扬、韩、魏,皆姬姓也,晋是以大。若非侵小,将何所取?武、献以下,兼国多矣,谁得治之?”又《左传》桓公三年:“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阍庭,韩万御戎,梁弘为右,逐翼侯于汾隰,骖絰而止。”³⁷沈长云先生指出此《传》文表明其时(引者按:指晋武公时)韩万已受封得姓,而灭韩更在此以前,即鲁隐、桓之世。³⁸也就是说,作为武王之后的姬姓韩国其灭亡时间应在春秋早期。

西周韩国被晋灭亡以后,晋人又封其后裔于韩原,此即春秋时期也即后来三家分晋的那一支韩氏。《史记·韩世家》:“韩之先与周同姓,姓姬氏。其后苗裔事晋,得封于韩原,曰韩武子。武子后三世有韩厥,从封姓为韩氏。”³⁹又《世本·氏姓篇》:“韩氏,出自唐叔虞之后,曲沃桓叔之子万食采于韩原,因氏焉。”⁴⁰前文已述,从器形上看旨扬铸的年代可以推定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这一时段内,此时西周韩国早已为晋国所灭,铸铭中“韩告公”“旨扬”这对父子,只能是被晋国封于韩原的韩武子之后。

三、旨扬铸铭文与韩国世系校正

《史记·韩世家》对东周韩氏的世系有着详细记载,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情况如下:“武子后三世有韩厥,从封姓为韩氏”,“而韩厥在一卿之位,号为献子”。“晋悼公之七年,韩献子老。献子卒,子宣子代”。“晋定公十五年”,“宣子卒,子贞子代立”。“贞子卒,子简子代。简子卒,子庄子代。庄子卒,子康子代”。“康子卒,子武子代”。“十六年,武子卒,子景侯立”。“九年”,“景侯卒,子列侯取立”。“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十年,文侯卒,子哀侯立”。“六年,韩严弑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⁴¹

此韩氏之世系亦见于《世本》:“桓叔生子万,万生赅伯,赅伯生定伯简,简生舆,舆生献子厥,献子生宣子秦,宣子生平子顷,平子生简子不信,简子生庄子庚,庄子生康子虎,康子生武子启章,武子生景子虔,始立为诸侯,景子生武侯取,武侯生文侯,文侯生哀侯,哀侯生懿侯。”⁴²

另据《集解》《索隐》与《正义》,宣子名起,贞子名须⁴³,简子名不佞,康子名虎,康子之子武子名启

章,景侯(或称“景子”)名处,懿侯名若山。《史记》所记个别韩氏君主谥号或私名与《世本》有所不同,二者存有相互冲突之处,表明传世文献在韩氏世系的记载上原本既已存有不足和尚不明确之处。此外,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考辨》认为,“然则其时韩君实止两人,一名虔,即景子。一名取,即《史记》之所谓列侯与文侯,亦即《世本》之所谓武侯也。战国时一君两谥三谥者颇有之。如韩宣惠王即威侯,楚顷襄王又称庄王。则《史记》之韩列侯、文侯,与《世本》之武侯,实即《纪年》之列侯一人也。今《史表》分作两人者,盖亦由其称侯改元而误”⁴⁴。此说合《史记》“列侯”“文侯”与《世本》“武侯”“文侯”为一,试图弥缝文献中的冲突,可备参考。韩献子死于晋悼公七年,当公元前 566 年,为春秋晚期,哀侯在位六年被杀,杨宽先生曾据《竹书纪年》考证其当卒于周烈王二年,亦即公元前 374 年⁴⁵,此时已进入战国中期。

前文已经论证旨扬铸所载“韩告公”与“旨扬”父子应属《韩世家》这支韩氏,“韩告公”为谥称,“旨扬”为私名,典籍记载中从韩献子至韩哀侯,韩氏君主均为父子相传。但奇怪的是,无论是在《史记》还是《世本》里,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韩氏君主中并没有一位“告公”,即使是将范围扩大至《史记》《世本》等文献所见的整个春秋和战国时期的韩氏世系资料,也同样没有发现“告公”的影子。

然而《史记》《世本》均言韩武子名启章,“启章”与“旨扬”上古读音十分接近,完全可以相通。启属溪纽脂部,旨属章纽脂部,从旨谐声的字有“稽”,则属溪纽脂部,与“启”字声韵全同,《国语·吴语》:“行头皆官师,拥铎拱稽。”韦昭注:“唐尚书云:‘稽,桀戟也。’”⁴⁶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言“稽”假借为“桀”⁴⁷,启为“桀”字声符,《说文·木部》:“桀,传,信也。从木启省声。”⁴⁸可证旨、启音近。扬从易声,章、易均属阳部,章为章纽,易为喻纽,同属舌音。章、喻二纽关系密切,如:“戴”字从异得声,其在史墙盘⁴⁹中的异体叠加“职”为声符,而在楚简中还有写作从首从之声的异体⁵⁰,“异”属喻纽,而职、之二字则均属章纽。《尚书·洪范》“俊民用章”,李善注《文选·奉答内兄希叔诗》引作“峻民用康”⁵¹,“章”“康”互为异文,楚叔之孙朋鼎自名为“灋鼎”⁵²,“灋”,从“康”声,学界已公认其字应读为“汤”⁵³,亦足以说明“章”“易”音近。由上可知,

从语音通假的角度来看,铸铭“旨扬”读为“启章”是很合适的。不同文献所载的韩氏君主私名音近通假,是已有先例的,如《史记》韩贞子,《世本》作“平子”,《史记》言简子之名为“不信”,《世本》则记为“不佞”,“贞”(端纽耕部)与“平”(並纽耕部),“信”(心纽真部)与“佞”(泥纽真部)^{⑤④}均属通假关系,铸铭之“旨扬”和典籍之“启章”与此同例。

若“旨扬”即是韩武子“启章”,那么铸铭中“韩告公”所对应的就是《史记·韩世家》等所载的韩武子启章之父——“韩康子”(名虎)。“韩”为氏名,“告公”“康子”均为谥号,称“公”或“子”只是尊荣程度的不同,后代称先祖为“公”有故意拔高其祖先身份地位的目的。朱凤瀚先生在讨论西周封君称谓时就曾指出过,畿外封国始封君生称“侯”者,卒后常被尊称为“某(国名)公”,其性质近同于谥名。“公”在尊贵感上确要强于“侯”,故才有此追称。^{⑤⑤}“韩康子”死后,其子“旨扬”尊称其为“公”是易于理解的。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铸铭“告公”之“告”,何以《史记》《世本》写作“康”?首先要说明的是,告字上古音属见纽觉部,康字则属溪纽阳部,二字声纽虽近,同属牙音,但韵部却相差较远,所以两者不会是音近相通。排除了告、康通假关系之后,我们认为“告公”与“康子”之间的关系应有两种可能。《韩世家》与《世本》虽均明载“康子”生“武子”,但是典籍中关于韩康子灭知(智)氏(前453年)以后的生平却记载不详,《韩世家》在“康子与赵襄子、魏桓子共败知伯,分其地,地益大,大于诸侯”之后,紧接着就说“康子卒,子武子代”(前424年),这样看来,从康子败知伯至武子即位之前的韩氏历史,在《史记》记载中存有近二十九年的空白。那么“康子”与“武子”之间原有一代君主——告公,而典籍失载的可能性似乎是可以考虑的。若依此说,则铸铭中的“韩告公”就应当是韩康子之子,韩武子之父,这是“告公”与“康子”关系的第一种可能。

此外,在战国文字以及秦文字中告、康二字上部均有大致作“虫”形的偏旁,下部、中部又分别大致作“口”“田”之形^{⑤⑥},字形上有一定的相似度,所以“告公”与“康子”关系的第二种可能就是:史书所载“韩康子”之“康”或是“告”字的传抄之误。在文献记载中韩贞子之名或作须或作顷,景侯之名或作虔或作处(處),同属于字形上的形近讹误。此外,秦

骊玉牍中的人名“骊”^{⑤⑦},李学勤先生已指出应即《吕氏春秋》高诱注、《后汉书·西羌传》以及《史记·秦本纪》索隐等文献所说的秦惠文王“骊”,典籍之“骊”乃“骊”之形误。^{⑤⑧}再如《史记·秦本纪》《十二诸侯年表》等所载的“秦宁公”之“宁”,据宝鸡出土的秦公钟^{⑤⑨}知当是“宪”字之形误^{⑥⑩},上述例证皆可说明古书在记载人名时的形近讹误现象。

合观以上两种推论,相较于将“韩告公”视为韩康子与韩武子之间的一代典籍佚记的韩氏君主,我们更倾向于认为“韩告公”即是典籍中的韩康子,而“康”为“告”之误字的这种可能,这主要是基于告、康在写法上确实较为形似,而“韩告公”为佚记韩君的推想尚缺乏更多证据的角度来考虑的。史载韩康(告)子与赵襄子、魏桓子共败知伯,事在公元前453年。韩武子于前424年即位,前423年伐郑,杀郑幽公,在位16年,于前409年去世。此二人的生活年代均主要集中在战国早期,这与从类型学角度推测出的旨扬铸所属时代正相契合。

四、结语

西周早期周王室分封有姬姓韩国,此国于春秋早期既已被晋国所灭,故铸铭“韩告公”之“韩”只能是被晋国封于韩原的那一支韩氏。^{⑥⑪}铸铭“韩告公”不见于传世文献所载的韩氏世系资料,然而“旨扬”却与韩武子私名“启章”音近可通,以此为基点,金文之“韩告公”正当对应《韩世家》《世本》所载的韩武子之父“韩康子”,“康”在战国以及秦系文字中与“告”字在形体上存有一定的相似度,由此可以推测,史载“韩康子”之“康”当是“告”之误字。《史记·韩世家》《世本》等传世文献对韩国世系的记载可能有误,典籍之韩康子本应当为韩告公,而韩武子之名又本写作“旨扬”,文献记为“启章”,乃借字。

注释

①①①④肥西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肥西县志》,黄山书社,1994年,第524页。②陆勤毅、宫希成主编:《安徽江淮地区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190、191页。③孙合肥:《安徽商周金文汇编》,安徽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0、181页。④《肥西县志》云铜铸通高为26.8厘米,此据《安徽江淮地区商周青铜器》所载。⑤《肥西县志》言其铭文为阴刻,《安徽商周金文汇编》从之,而《安徽江淮地区商周青铜器》则说为“铸有”,细看铭文,当以后者为是。⑥《肥西县志》未对铸铭进行释读,《安徽江淮地区商周青铜器》与《安徽商周金文汇编》释文一致,只是在个别文字隶定上有严格与否的

区别。《安徽江淮地区商周青铜器》将旨扬之“旨”括注为“稽”，未解释缘故。《安徽商周金文汇编》从之，本文则不取此说。此外，为便于排版，文中所引青铜器铭文资料的释文均从宽。⑦⑧⑨⑩吴镇烽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 29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171—176、177、201—234、363—376 页。⑪⑫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第 369、372—375 页。⑬陆勤毅、宫希成主编：《安徽江淮地区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14 年，第 191 页；孙合肥：《安徽商周金文汇编》，安徽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181 页。⑭“镇”当是“钲”字之误。⑮“纽”“钮”二字通用，此处《发掘简报》称“纽”，本文仍其故，下文同此。⑯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叶县文化局：《河南叶县旧县四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7 年第 9 期。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浙川县博物馆编著：《浙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大象出版社，2004 年，第 70 页。⑱李家浩：《夫狄申鼎、自余钟与化子受钟铭文研究》，《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研究丛书·李家浩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25—40 页。⑲马超、胡长春：《蕤子受铜器铭文“亡作”试解及其年代推断——楚历建丑说新证》，《四川文物》2017 年第 2 期。⑳陈梦家：《寿县蔡侯墓铜器》，《考古学报》1956 年第 2 期。㉑裘锡圭、李家浩：《谈曾侯乙墓钟磬铭文里的几个字》，《裘锡圭学术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54—60 页。㉒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金胜村 251 号春秋大墓及车马坑发掘简报》，《文物》1989 年第 9 期。㉓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晋东南地区文化局：《山西省潞城县潞河战国墓》，《文物》1986 年第 6 期。㉔郭宝均：《山彪镇与琉璃阁》，科学出版社，1959 年，第 70—73 页。㉕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中华书局，2009 年，第 1229 页。㉖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中华书局，2009 年，第 3944、4355 页。㉗“鸡”或省作“奚”。㉘张天恩主编：《陕西金文集成》第一集，三秦出版社，2016 年，第 48—51 页。㉙学界有关簋铭释读意见的讨论参马超：《近出商周金文字词集注与释译》，西南大学中国史流动站 2019 年博士后出站报告，第 140—145 页。㉚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中华书局，2009 年，第 3995 页。㉛“芳姑”依据金文女性称名规则，应是出自姑姓芳地的女子。昔鸡于韩国迎接芳姑，则韩地应在宗周与芳地往来的顺道途中，至于其与韩国是否毗邻以及距离的远近，则尚不可知。有学者据“芳”地以推求韩国地望（武刚：《周原出土昔鸡铜簋与西周韩国封建问题新证》，《历史地理》第三十八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 39—47 页），此说是建立在假设芳、韩临近的基础之上，仍恐证据不足。㉜吴镇烽主编：《商周青铜器铭

文暨图像集成》第 5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247 页。㉝谢明文：《释西周金文中的“垣”字》，《商周文字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第 265—270 页。㉞诸说详情及其评述参杨亚长：《浅说金文新见之韩侯》，《文博》2018 年第 3 期；武刚：《周原出土昔鸡铜簋与西周韩国封建问题新证》，《历史地理》第三十八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 39—47 页。㉟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中华书局，2009 年，第 4355、3792 页。㊱沈长云：《西周二韩国地望考》，《中国史研究》1982 年第 2 期。㊲⑳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4 年，第 2259、2259—2263 页。㊳⑳秦嘉谟等辑：《世本八种》，商务印书馆，1957 年，第 223、49 页。㊴《世本》作“平子”。㊵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2005 年，第 166 页。㊶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65 页。㊷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修订本）》，中华书局，2016 年，第 548 页。㊸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中华书局，2016 年，第 592 页。㊹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 年，第 124 页。㊺吴镇烽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 25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599 页。㊻周忠兵：《说古文字中的“戴”字及相关问题》，《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364—374 页。㊼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二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 1215 页。㊽吴镇烽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 3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499 页。㊾李零：《楚国铜器类说》，《江汉考古》1987 年第 4 期。㊿“佞”或有学者归入耕部，此采陈复华、何九盈《古韵通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第 303 页）之说，归入真部。㊽朱凤瀚：《关于西周封国君主称谓的几点认识》，《两周封国论衡——陕西韩城出土芮国文物暨周代封国考古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279 页。㊾告、康二字的写法参徐在国、程燕、张振谦编著：《战国文字字形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第 132、997 页。㊿秦玉牋又称秦玉牋、小子玉牋、曾孙玉牋等，见吴镇烽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 35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455—458 页。㊽李学勤：《秦玉牋索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 年第 2 期。㊾吴镇烽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 28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549 页。㊿卢连成、杨满仓：《陕西宝鸡县太公庙村发现秦公钟、秦公钫》，《文物》1978 年第 11 期。㊽先秦时期铜器流散现象常见，其原因多样，如战争、馈赠、族群迁徙、通婚等等，韩氏铜器旨扬钫为何出土于安徽肥西，暂时不详。

责任编辑：王 轲

Study on Zhiyang Bo and the Genealogy of Han

Ma Chao Zou Fudu

Abstract: Based on the shape, Zhiyang Bo can be presumed as the kind of utensils which was produced around the lat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early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inscriptions of Zhiyang Bo contained names "Han Gaogong" and his son "Zhiyang". The surname of "Han Gaogong" referred to the "Han" family in Kingdom Jin after the Eastern Zhou Dynasty. The inscription "Zhiyang" should be read as "Qizhang", which was Han Wuzi's private name. Judged from this, "Han Gaogong" corresponded to "Han Kangzi", the father of Han Wuzi. The writing of the characters "Gao" and "Kang" were similar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Qin Dynasty. The character "Kang" in "Han Kangzi" recorded in history books is likely to be mistakenly spelled as "Gao".

Key words: Zhiyang Bo; genealogy of Han; Han Gaogong